

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相声史论结合之作

《中国的相声》是薛先生独著的一部相声史，用薛宝琨自己的话说，是试图以“史话”贯通古今的方式，将近现代和当代相声发展的历史脉络，以不同层面的重点人物为代表，采取以点带面、史论结合、论由史出的办法，从焦点的括叙和评论中勾勒相声的历史概貌，揭示艺术发展的规律。他不无自负地说，此书“或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相声史论结合之作”。

薛宝琨虽然研究的是热闹的相声和曲艺，但他保持着学者的严谨和良知，有着深沉的历史感，并不媚俗。前些年，马季去世时，媒体上对马季“大师”之称流行一时。对此，薛宝琨接受媒体采访，直言他心目中的相声大师只有四位：张寿臣、刘宝瑞、侯宝林、马三立，而马季算不上大师。他说，张寿臣建国以前就是大师，传统的单口相声经张寿臣之手，达到经典的程度。单口相声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艺术之林，它延续或者继承了清代的活本小说这一脉，同时又具有喜剧的元素。张寿臣的单口相声《小神仙》《化蜡打》是民国时代社会众生相的写照。刘宝瑞是张寿臣的徒弟，他写传奇故事，写历史往事，从笔记小说汲取养分，用相声讽刺官污吏，他的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《官场斗》活画出那个时代的民俗和民风。第三位是侯宝林，他是雅的代表，侯宝林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，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，他力挽狂澜，使相声起死回生，从低潮走向复兴，从地摊登上大雅之堂。第四位是马三立，他是传统相声的代表，马三立把相声做到大俗的程度，因为他长期在底层生活，对底层民众熟悉。马三立是相声这个门派里唯一有文化的，他是文哏的代表。薛先生的论断，可以说清音独响，让公众有个清醒的认识。薛先生说，我们不必急着确定谁是大师，任何大师都是要经历和时间的积淀，“我认定侯宝林是大师，是在他去世十年以后”。

薛宝琨在研究曲艺特别是相声的时候，注意挖掘历史发展的时代背景，特别关注与分析不同演员和创作者的美学特点，对这些加以概括，并加以理论的总结。他出手的文章论著，都是资料翔实，有理论深度，而且文笔优美流畅。他有深厚的美学理论素养，有深厚的文史知识体系，评论客观中肯，高人一筹。他不回避那些名家各自的优缺点，不拘泥。谈优点，不溢美；谈缺点，中肯而又“婉而多善”，多从积极的方面着眼。所以，被评论的、被批评的那些即使很有名的明星，也都服他的气。他以“文而不瘟，雅俗共赏”概括苏文茂的相声风格；以“绚丽也朴实”评论刘文章的艺术特点；他评论魏文亮，说他深知“相声味儿”，懂得相声的奥妙不止于语言的“婉而多讽”，还在于它的奇思妙想，魏文亮擅长的模拟“因童趣而更加离形得似”。

薛先生的相声评论和研究，不仅使相声爱好者受益，也使相声演员受益，也使得众多相声爱好者受益，大家因他的工作而更加了解相声，热爱相声，同时也帮助我们欣赏相声，提高了观赏者的欣赏水平。薛先生认为，马三立是津门相声的魂魄，马三立的表演本真自然朴巧，心平气和绝无造作，马三立的风格虽可用一“俗”字代表，但不是伤俗、庸俗，而是真俗、大俗、美俗，是大俗入雅。薛先生从刘宝瑞“迟急顿挫”的节奏里，看出有书路（评书）的起承转合，从刘宝瑞的“顶创撞盖”的语势里，看出气氛的浓淡张弛，他甚至从刘宝瑞“铺垫系抖”的包袱里，看到人生和生命的“成住坏空”。

这是怎样的一种欣赏和共鸣啊？可以说，薛宝琨不仅是侯宝林先生的知音，也是所有相声演员的知音，说他是相声在学者中最大的知音，恐怕也不为过。



我到北京工作后，又因为工作关系，采访过薛老师。一九九五年一月四日开始，《光明日报》新创了两个周刊，文化周刊和家庭周刊。那是那几年报纸杂志化浪潮中的两朵浪花。文化周刊是每周三出版，主编是沈卫星，编文化周刊第一版的，是杭天勇。他那时锐气正盛，天天憋着要整些大稿子，要轰动轰动。那一年，正好是第四十三届世乒赛在天津办，他就找我，想围绕天津做些文章。为了这个报道，我当然要采访一些天津的学者作家，其中就想到了薛先生，因为薛先生研究俗文学，是一个大的方面，而天津在这方面有的说。

《打破天津文化弱势》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第9版。报道大概四千字，但历史、文化内容比较多，采访的人也很有代表性，比如王辉、薛宝琨、马骥才、滕云，还有朱光磊、张国刚等等。报道总体上不是一个常见的宣传的调子，而是比较纵深的报道，并且带有反思性，提出了问题。其中，借学者之口，对天津文化发展相对落后，有一定批评，其中最尖锐的，当数薛宝琨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薛先生讲完，我出于职业习惯，特地问他，您说的这些话比较尖锐，我就这样原话报道，没问题吧？写成稿后，您要不要过目，再看一下？薛先生说，没问题，就这样登，你不用给我再看了。

薛宝琨是一九六一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，就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文艺部当编辑，后来又调到广播说唱团任创作员。在广播说唱团，他写歌词、相声、鼓词，也就是



▲薛宝琨(右)与侯宝林在一起

在那里，他结识不少曲艺圈儿人，和侯宝林等人建立了友谊。一九六六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广播事业局被砸烂，薛宝琨在劫难逃，被下放到北大荒接受改造。后来，又迁到河南南阳。在此期间他挨过整。据说，那几年他心灰意冷，就想在河南安家落户，种地为生。

一九七一年“九一三事件”发生的时候，薛宝琨和侯宝林坐在田间干活，那时侯宝林是“反动权威”，薛宝琨是“黑五类”，都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，正经历着“人生最晦暗的时候”。在一九六六年以前，薛宝琨跟侯宝林的相处是彼此礼貌客气，互相尊重。一九六六年以后，两人一块儿倒了霉，一块儿下干校，就成了患难之交，无话不谈。当时并没有人向他们传达林彪事件，但是薛宝琨跟侯宝林说你可能要回去了，你回去得肯定比我早。侯宝林不信。薛宝琨说：“您记住今天这个日子，看我说的灵验不灵验。”果然，不到一星期，侯宝林就被宣布允许回家探亲，回去以后就再没有返回乡间劳动。一年以后，薛宝琨也回到了北京，回到广播说唱团。一九七三年国家政策有了变化，社会氛围也有调整。不过，薛宝琨已经不想再在电台工作，于是，他回到天津，落到了南开大学中文系。

薛宝琨对侯宝林的研究，是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逐步深化的。薛宝琨是这样定义侯宝林这个“大师”的，他说：“侯宝林是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的相声大师，是举国闻名、世界瞩目的杰出艺术家。他继承并发扬了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，改变并提高了相声的艺术格调。在相声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中，他起到了筚路蓝缕、披荆斩棘的作用。”

但薛宝琨并不是像一些学者一样，一旦研究某个作家，就无限夸大这个作家的成就，不是的，薛宝琨在充分肯定侯宝林的历史贡献之后，接着说，“可以说侯宝林是这样一位大师：他不是作家，几乎没写过多少作品，但许多作品经他之手却立见新意、顿时生辉；他也不是语言学家，几乎在这方面并无专著，但是，语言一上他的口却变幻无穷、风趣盎然；他不是评论家，几乎从不对艺术现象品头论足，但他却以自己的行动回答了相声应该怎样和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是相声传统的体现者，也是相声革新的勇士——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重任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统一。他热爱这种‘俗’的形式，却又赋予它‘雅’的生命——他是相声中见雅、化俗为雅的带头人”。这些论述，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，什么是学术的严肃和学者的分寸。

薛宝琨：相声在学者中最大的知音

祝晓风



“生命和人性却并未曾有过一丝毁灭”

大概十年前，我回天津，还见过一次薛先生。我当时曾经想约薛先生写文章，和我的研究生老师张圣康说起来，张老师就帮着联系，又一起和我去了一趟薛先生家。张老师和薛先生都是北大中文系出身，薛先生虽然晚两级，但他们关系一直不错。那次见面，聊的时间也不长，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。那时，薛先生的听力已经不好，一般说话，他听不大清楚，所以和他交流也不多。只是他和张老师聊一些闲天。——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薛老师。

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，薛宝琨在天津市黄河医院逝世。薛宝琨就是天津人。一九三五年生，与圣康老师同庚，都属猪。一九四八年，薛宝琨报考商业学校，一九五〇年，薛宝琨在知识书店当实习生，站了一年柜台，转年复学，到一九五四年在天津医药公司采购供应站当会计。一九五六年，薛宝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反右斗争后，他钻研外语，想搞翻译。我查网上的材料，知道薛宝琨是一九五六年入党，但因替别人打抱不平，便以庇护右派和走白专道路为名被取消了预备期。一九七九年北大为他恢复了党籍。据说，他当年曾提出“三小主义”，即，在小城市生活，找个小单位，做点小差使。这也使得他在“文革”中遭到批判。薛先生有老派文人的道德操守。从公德说，他作为学者，正直，讲真话，比如，那次他对

天津人文化性格的直言，比如，几十年来，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，他在书中对他所熟悉的众多曲艺界人士，包括许多相声名家的评论，他都实事求是，立足作品，立足创作实绩，把他们放在一个历史的维度中，给予一个恰当的位置。他曾公开说，“我一个学者不能说违心的话，虽然违心之说能得到好处，但是那样就不是薛宝琨了”。从私德说，也有一件事，让大家钦佩。因为薛先生的夫人长年病卧在床，所以，薛先生开会时从不在会议上用餐，而是赶回家亲自照料妻子的饮食起居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二十多年如一日。反观时风，还有近年不断曝出的高校教师的各式“新闻”，怎不让人感慨。

受薛先生感染，南开有不少学生，后来都从事与曲艺有关的工作。其中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，薛先生有个得意门生鲍震培。二〇〇五年五月，全国书市在天津举办，《中华读书报》做了一个专刊。我专门请鲍震培给我们写了一篇《天津的说唱艺术》，为报纸增辉不少。鲍震培最近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《相声病了，得治》（2018年8月18日），很犀利，很中肯，影响很大。这篇文章的风骨和专业水平，让我又想到薛先生。

薛先生曾说：“记得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：‘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将会过去；而那过去了的，必将是美好的回忆。’——是的，我们这一代确实浪费过许多光阴，但生命和人性却并未曾有过一丝毁灭。我们曾经不幸过，但我们今天却是万幸的。我们经历的或许有过太多的痛苦，但我们回味它时，却在不断荡起的淡淡哀愁中，发现了无可重复和永存无限的快乐。”这段话现在读来，仍不免让人怅然。（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，作家，居京）

▲绘图/叶浅予

相声研究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标志



薛宝琨先生为我们这一级学生开“民间文学”课，是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，于今有三十个年头了。也是在课堂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这位老师。

说传说，一点儿没有夸张。刚入学时，就有高年级的同学，跟我们讲南开中文系一些比较有点特点的老师的故事，薛宝琨是其中之一。一是因为他名气大，二是因为他有特点。流传的薛先生的故事之一，是说他在课堂上讲课时，提到中文系时，总是说“贵系”。——第一次听的时候，还以为说的是旧时代的“桂系”军阀。既说贵系，显然，薛先生当时就不是中文系的了；另一方面，谁都听得出来，他既说贵系，也显然有一种别样的味道在里边。不过，薛先生和中文系自有渊源，他以前曾在中文系工作过多年，而且讲的又是民间文学，与文学关系密切，所以中文系请他还在这边“鄙系”开课。

薛先生在课堂上讲课，虽带着讲稿来，但讲时其实并不怎么看。在黑板上写下这节课的主题，就开讲。往往一节课讲下来，黑板上就一个词，几个字。他梳着大背头，眼角很长，嘴角也很长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许多时候是站在讲台的左侧，重心落在右腿上，左腿伸向左前方，比稍息的步幅还要大一点儿；背着双手，头向左上方扬着，并不怎么看教室里听课的我们，而是眼睛望着左上方，好像在天花板上还有人在听他的课。

果然，第一次上课，就亲耳听到他说“贵系”如何如何。

薛先生不是像有些老师，讲起课来，或者读作品时，往往情绪饱满，或者说情绪激动，有时还会随着作品中的人物或喜或悲；还有不少老师，在评论作家时，也比较情绪化，喜欢的，热情赞扬，讨厌的，怒斥贬斥，都在褒贬时明显地带出来。薛先生不是这样的。他说话不快不慢，情绪也很稳定，没有什么过喜过悲的表达，总之保持着一种客观的、审视的态度；他讲课没有口头语，没有多余的零碎的话。总之，从语言表达到台风身段，都很有风度。

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能出书的学者还很少，而薛先生那时已经出了不止一本书。一九七九年，薛宝琨参加钟敬文先生主编的《民间文学概论》，承担了其中重要章节。此后，薛先生又出版《曲艺概论》《相声艺术论》。为了学这门课，我从图书馆借过《民间文学概论》和《曲艺概论》。也是在这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之交，薛宝琨和汪景寿、李万鹏几位大学老师在北京“邂逅”，在侯宝林的发起下，组成相声史论研究小组，按薛宝琨的说法，由侯宝林“直接参与指导”。他们的成果之一，就是一九八一年出版了《相声艺术论集》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），一九八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相声溯源》。

《相声溯源》这本书对于相声有多么重要，怎么说都不过分。侯宝林认为，“相声这种民族民间艺术，集纳、吸纳、整合、参悟了所有的中国文化”。“民间笑话和喜剧艺术的讽刺精神、伶优艺人卓立舞台见机而作即兴发挥的滑稽意识，文人学士在语言文字游戏方面的幽默智巧，都显现了中国文化‘温柔敦厚’的‘诗教’精神，都蕴涵着中庸和中和的思辨哲学”。所以，研究相声，意义重大。只有了解相声艺术的历史渊源，才能正确认识它的发展过程和形式特点，也才能由此探讨更普遍的艺术规律，推动这门艺术的繁荣发展。

相声可溯之源虽然很长，但可证之史却很短。此前，虽有罗常培、吴晓铃、杨荫深、林庚等学者对此做过探讨，但大都是散论和单篇文章，没有从总体上对这一重要课题做出较全面的研究。侯宝林从一九四九年开始，就有为相声治史立论的理念，由来积久。——仅由此一点，就可见出侯宝林对于相声的贡献，是整体性的，是学术性的，也是历史性的，远超出一般演员的贡献。而《相声溯源》的出版，正是侯宝林这一理念的初步实现，也是相声真正有史，相声研究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标志。

《相声溯源》虽是薛先生与侯宝林、汪景寿、李万鹏合作的著作，但薛先生肯定在其中承担了更多的工作，这从多年后，中华书局版《相声溯源》（增订本）（2011年）的《再版前言》能感觉到。侯先生名望高，但写作并非他长项，而且他社会工作繁多，不大可能在具体的研究工作和写作中投入很多；汪、李二位，如果是承担了较多的写作工作，在前言中，薛先生会提到的；书的署名，顺序也是侯、薛、汪、李。这更可说明，此书的最主要的写作，是由薛先生承担的。

一九八二年，薛宝琨出版了《骆玉笙与她的京韵大鼓》一书，这一年，他还与侯宝林合作，写出了《侯宝林与他的相声艺术》。一九八五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《笑的艺术》，此书涵盖面很广，几乎对所有的俗文化体裁都有较深入的论述，建立起薛宝琨自己的一定的体系。也是在八十年代，中宣部策划，人民出版社组稿，出版一套《祖国丛书》，其中，由薛宝琨撰写《中国的相声》一书。《笑的艺术》《中国的相声》连续两年获一九八六年、一九八七年天津鲁迅文艺评论奖，《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》获一九八三年天津哲学社会科学专著三等奖，《中国的相声》还得过全国曲艺理论科研成果优秀奖。在薛先生给我们上课的这一年，一九八九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《中国幽默艺术论》。

这门课在中文系开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是选修课，两个学分，也就是一周上一次，连着上两节。那个学期好像比较短。我印象中，这门课他只讲了十来次，就到期末了。中间他好像出差了一次。曾听高年级的同学说，他曾在这门课上，请过侯宝林来讲，也请过天津的一些相声名家。可惜，轮到我们的时候，这些福福都没落着。